



中国人民大学“211工程”建设成果

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化研究

主编 // 安启念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化研究

主编 // 安启念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安启念主编.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ISBN 7-300-07337-9

I. 马…

II. 安…

III. 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研究-中国

IV. B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47639 号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

主编 安启念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239 (出版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三河市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150×230mm 16 开本

版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张 39.75 插页 2

印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584 000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研究，今天正处在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头。这是因为，我们现在必须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研究中最根本的问题，作出新的回答。能不能正确回答这个问题，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研究进一步发展的关键。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而且对此深信不疑。但是时至今日，这种看法很难再继续下去了，因为它遇到了三个重要的问题。

第一是所谓“马恩对立”的问题。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关系，早在恩格斯去世不久便有人讨论。1923年出版的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和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明确对恩格斯的以及列宁和苏联哲学家的哲学思想提出批评；1932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问世后，马克思恩格斯哲学观点的区别与对立立即成为一些西方学者的热门话题。此后很长一个时期，认为哲学家马克思与哲学家恩格斯的观点相对立的说法在西方国家广泛流行，为人们普遍接受。过去我们可以用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对立把“马恩对立”说斥之为资产阶级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但是近年来在我国也出现了类似的观点。现在国内有不少学者主张放弃“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转而使用“马克思哲学”，实际上也是要突出强调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的不同。有的人还撰文把“求异思维”作为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的重要方法论原则。坚持或倾向于

“马恩对立”的学者，不论在国外还是在国内，基本观点是：马克思是人道主义者，实践唯物主义者，以人的能动的实践活动超越了一切形而上学；恩格斯则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建立者，强调世界的物质性、客观性，贬低人的价值，按照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说法，应该归于旧唯物主义者之列。按照这样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分别属于前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根本性质不同；即使要继续使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概念，也要把恩格斯及其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排除在外。

由此可见，继续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同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已经关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存在的问题了。

第二是如何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对十六大以来中共中央一系列重要思想和方针加以解释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近些年一直是热点问题之一。其中的原因，说到底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新的实践、新的理论，迫切需要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角度加以说明。对于改革开放方针的确立，邓小平理论及其提出，乃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可以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的深化与落实加以说明，然而要用它解释中共十六大以来的一系列新思想、新方针，例如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等等，则比较困难。因为这些思想和理论很难纳入到我们现在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框架之中。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精神是强调世界的物质性、物质世界的运动性及其运动规律的客观性、必然性和可知性，这是一种能够指导我们“实事求是”的哲学理论。我们长期以来一直把它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画上等号，把凡是与它不一致的思想，主要是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论述，视为马克思的思想还不成熟的标志，视为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思想对马克思的影响。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十六大的召开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自中共十六大起，在坚持发展经济的同时，中国共产党日益加强对人的问题、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等问题的关注，并在此基础上先后提出了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等前所未有的新思想、新方针。这些思想和方针涉及的不是对客观规律的认识，不是“实事求是”，因此很难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对它作出正确的认识与评价，很难把它们的出现纳入原有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思路之中。

它们所涉及的，更多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道主义、人的全面发展、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相互和解的思想，具体说，主要是马克思早期的以及恩格斯晚年的思想，而这些思想过去是被我们排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外的。如果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同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并用它们来解释以人为本等新思想，那就必然会贬低、歪曲这些思想，甚至对它们得出否定性的结论。

第三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性的理解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没有当代性，或者说它还有没有现实意义，有没有生命力，取决于它能不能回答当今现实生活提出的各种重大问题。在 18、19 世纪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在 20 世纪大部分时间里的苏联和中国，认识和掌握世界的客观规律，进而富有成效地改造世界，是最重要的任务，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其现实意义不容置疑。但在今天，改造自然、发展生产虽然依然是人类生活的主要内容，却已不再具有以往那种紧迫性。现在，最紧迫的是人的生存、人的发展，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即发展是否可持续的问题。这也是时代提出的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回答的问题。显然，如果只讲世界的物质性、运动性及其运动规律的客观性、必然性、可知性，是无法回答上述问题的，而那将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只属于上一个时代，不再具有当代价值了。

以上问题的出现表明，我们不能继续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简单地等同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把马克思早期的许多思想也包括在内。

之所以应该改变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其实最主要的还不是由于以上问题的出现，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来就应该也可以包括马克思的早期思想。这里所说的早期思想，主要是指《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思想。马克思自己曾经说过，他的思想转变发端于莱茵报时期哲学理论与客观现实之间的冲突引起的思想苦恼，因此他开始批判黑格尔哲学，写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及《〈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在此过程中，他进一步感到问题的真正答案应该到经济学研究中去寻找，于是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其成果就是《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说他的哲学思想形成于政治经济学研究之中，而这一研究主要是在巴黎进行的。我们没有理由认为马克思对自己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思

想是持否定态度的。此外，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形成标志是什么？在这个问题上学术界大概没有人会否认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尤其是该提纲的第一条。然而只要略加对比就可以看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的思想正是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哲学思想的概括。二者的区别仅仅在于，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的思想还穿着费尔巴哈的外衣，即在表述中使用了许多费尔巴哈的术语，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则把这件外衣也抛弃了。至于思想，二者是完全一致的。^① 经过长期的研究，今天我国学术界已经公认实践唯物主义是马克思最重要的哲学思想，而实践唯物主义思想的诞生地，正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还不仅如此。以往在讲到共产主义时，我们主要强调的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现在我们认识到，按需分配只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条件，人的自由才是共产主义的根本特点。然而这一思想同样来自《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对于马克思早期思想的评价问题，我们还可以继续研究，但是不能像以往那样把它排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外，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没有对它们的哲学思想做过全面系统的阐述，他们没有给我们留下一个他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但是研究表明，马克思不仅提出了实践唯物主义，而且也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恩格斯不仅详细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而且对实践唯物主义也有论述。揭示以往被人们对立起来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与实践唯物主义的内在联系，阐述它们的统一性，这虽不是本文的任务，但我们可以肯定，这种联系和统一性的确是存在的。

但是，一旦改变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把马克思早期的思想也包括在其中，我们立刻就会发现，这一改变牵一发而动全身，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包括它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都要重新审视，而这将引起一系列的重要变化。

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一般规律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按照传统的说法，马克思主义哲学

^① 参见安启念：《新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55～60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运用，通过运用使之具有了“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个说法基本上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如上所述，马克思恩格斯有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但又从未对他们的这些思想做过全面系统的表述，因此我们不可能有一个现成的完整的可以拿过来就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运用之前首先要对马克思恩格斯丰富的哲学思想加以选择，被“化”的只是其中被选中的那些思想。此外，这里所说的“化”不仅仅是个“作风”和“气派”的问题，或者说它不是“物理过程”，而是“化学过程”。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的实践经验的结合、化合。像化学反应一样，生成的是与参加反应的任何一种因素都不完全相同的新的存在，这些因素在化合过程中都发生了性质的改变。在现实层面上看，其产物完全是中国特有的哲学理论，我们之所以把它称作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因为它产生于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在中国的运用，在基本精神上保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点。毛泽东哲学思想便是如此。

其次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评价问题。在以往很长一个时期里，我们把“西方马克思主义”排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外，因为它不符合并且批判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然而在今天看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是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和实践需要出发对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作出的与东方国家不同的选择。他们没有强调世界的客观性、必然性和可知性，也没有强调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作用，因为与东方国家不同，在他们那里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不成熟。但是在那里马克思所批判的“异化”问题比以往更为严重，而且有了新的发展。不仅资本在奴役人，技术和科学也具有了意识形态功能；被奴役、被支配的不仅仅是工人，而且是一切人。从这样的国情出发，马克思主义者唯一能做的工作就是从根本上对资本主义文化进行批判，进而启发工人阶级的以及全体民众的觉悟，否定资本主义制度，实现人的解放。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具体观点我们未必同意，然而我们能就此否认它是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与自己面临的实践情况相结合的产物吗？更重要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变化使得我们面前出现了与20世纪西方国家相类似的某些情况，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许多思想对我们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已经被我国哲学界

普遍接受。

再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发展，有没有失败的时候？按照以往的说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在中国的运用，由于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所以在它的运用中是不可能失败的。马哲史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丰富发展的历史。这一说法应该重新看待了。如前所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首先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从自己的实践需要出发对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的选择，是被选择的思想与中国文化以及中国革命经验的化合，其中包含着选择者对这些思想的理解和自己的思想创造。因此在选择、理解、创造等环节上都有可能发生错误，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误入歧途。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文化大革命”中的斗争哲学、唯意志论，就是实际教训。

最后，一旦我们改变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中共十六大以来的一系列新思想、新方针立即显示出它的重大理论意义。历史地看，以往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并没有错。因为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人与人的斗争，即阶级斗争；人与自然的斗争，即发展物质生产，是我们的主要任务，而在这里，认识与掌握客观规律至关重要，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也因此被我们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有价值的内容。²¹世纪初，我国的实际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人的价值、人的发展，成为我们今天面临的最重要的课题。党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等一系列新思想，是从新的情况出发对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的新的选择，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这些新思想的意义还远远不止如此。今天，经济全球化席卷全球，资源、环境、生态危机的日益凸显使得可持续发展成为人类命运攸关的问题；随处可见的国际冲突，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断翻新的情况下威胁整个人类的生存；人的价值高于物的价值，经济发展要服从于人的发展，正在成为人们的共识。在这样的背景下看，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世界，不仅是中国人的，而且是全人类的迫切要求。因此，十六大以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这些新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最新成就，也具有世界历史意义，

是当今时代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

以上认识是本书研究和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的思想前提，它们自然还有可商榷讨论之处，研究和写作过程也必定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尤其是对十六大以来党中央一系列新思想的理解认识，由于没有时间距离，严格说来尚在进行过程之中，要形成成熟意见，还有许多路程要走，本书只是初步探索。如果说本书有什么特点，应该说创新是基本特点之一。也正因为如此，书中不少思想可能还显得有些粗糙，要对这些想法加以推敲、检验、修正，使之变成成熟的理论，只能是下一步的任务了。

导 论	1
一 充分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的 复杂性	2
二 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一般规律	5
三 影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几个具体因素	10
四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四个阶段、三种形态	15
五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华民族的思想启蒙	20

上 编（1919—1949）

第一章 20 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与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化	27
一 20 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	27
二 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选择	40
三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 特点	52
第二章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 传播	57
一 五四新文化运动	57
二 中国社会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	68
三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91

第三章	实事求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	
	核心	115
一	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及其形成	115
二	实事求是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核心	129
三	实事求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141
第四章	阶级斗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焦点问题	150
一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阶级斗争理论	150
二	阶级斗争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焦点问题	160
三	突出阶级斗争的作用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169
第五章	作为中国革命战略、策略的哲学基础及工作	
	方法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182
一	“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182
二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革命道路的确立	185
三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斗争策略	190
四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共产党的军事理论	193
五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党的建设及共产党员的修养	198
六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工作方法论	204
第六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学术领域的影响	209
一	学术领域的激烈斗争	209
二	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的出版与哲学理论探讨	217
三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	227
四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	233
第七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	240
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文化背景与中国传统文化	240
二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中国文化的现代	

转型	251
三 中国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影响	261
第八章 毛泽东——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杰出代表	269
一 中国革命何以选择了毛泽东	269
二 毛泽东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化的集中体现	274
三 毛泽东哲学思想再认识	281

下编 (1949—)

第九章 社会主义实践的艰难历程	291
一 重大的历史性转折	292
二 两种思想的斗争	297
三 “左”倾思想的泛滥	305
第十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曲折道路	311
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广泛传播	312
二 哲学领域的斗争	318
三 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中的两种倾向	329
四 哲学的政治化	341
第十一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中的理论失误	350
一 斗争哲学——对唯物辩证法的片面理解	350
二 上层建筑决定论——对唯物史观基本理论的 误读	357
三 唯意志论倾向——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 的颠倒	368
第十二章 后发展国家、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化	379
一 中国社会发展的落后性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	379
二 中国传统文化对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的影响	388
三 毛泽东的乌托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的影响	396
第十三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405

一	改革开放——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	406
二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实践任务的变化 及其带来的哲学变革	414
三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的扩大	423
四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问世及其影响	434
第十四章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崭新形态：实践唯物 主义	443
一	关于人、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	443
二	实践唯物主义研究的兴起与深化	453
三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理解	467
四	实践唯物主义研究的历史意义	478
第十五章	开放的中国与走向开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486
一	“中、西、马”哲学对话	486
二	“回到马克思”	522
三	应用哲学的兴起	538
第十六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新世纪的新趋势	548
一	社会生活的新变化	548
二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趋势	575
参考文献		610
后记		620

中国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是一场社会革命，也是一次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作为思想解放运动，它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改变了我们对许多重大问题的具体观点，更在于开阔了我们的视野，启迪了我们的思路，改变了我们研究问题的方法。最后一点，也即方法论上的革新，意义尤为重大。它能带来理论研究中的根本性变化。

当我们从方法论的高度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时，以往这一研究领域的不足之处表现得十分清楚：第一，我们过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主体（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各种主观因素的复杂情况和重要作用考虑不够；第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客体”，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复杂情况也少有分析。很多时候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看得过于简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与运用。在研究这一过程时，我们不应该把自己以往形成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绝对化，要充分考虑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特殊情况；我们必须考虑到作为主体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解运用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著作和思想时，各种主观因素，时代的、历史文化传统的、实践需要的，甚至个性的因素，所起的重要作用。概括地说，也就是要研究借鉴当代西方哲学中诠释学的成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作为一个复杂的、主客观因素在理解和实践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的过程中相互作用的过程来看。方法上、视角上的这种变化会把我们的研究带入一个崭新的境界，发掘出许多新的内容。



一 充分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化问题的复杂性

讲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流行的看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组成部分，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要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二是要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①。这种看法是依据毛泽东的相关论述提出的，一直被认为具有无可置疑的权威性。

然而，实际上它恰恰是有问题的，是应当加以分析的。问题主要有两个：

第一，上述两个方面的内容实际上并不是“中国化”的表现。“应用”不等于“化”。某种理论的“应用”是指用它解决问题，“化”则是指这种理论本身的变化。“应用”充其量是为理论的变化提供条件，但不能等同于变化。具有了“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也不是“中国化”的主要内容。毛泽东曾说：“‘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②。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思想或语言资源概括和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例如毛泽东用“知行观”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理论与实践相互关系的理论，只是赋予了这一理论以中国人熟知的形式，内容上则可能完全没有变化。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了“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当然也是其中国化的表现，但充其量只是“彻里彻外”中的“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主要内容，更不是它的全部。我们所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经过在中国的应用与发展，在内容上具有了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所没有的中国特色。再进一步说，主要是指内容，而不是形式。

^① 参见汪信砚：《视野、论域、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研究中的三个方法论问题》，载《哲学研究》，2003（12）。

^②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84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第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上述理解，把问题大大地简单化了。

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某一种理论被人们接受并加以发展，是作为主体的接受者充分发挥自己的主体性，对所接受的理论文本进行选择、解读、阐释、补充、创新的过程，接受者的实际需要、历史背景以及他无可选择地沉浸于其中的文化传统，在这一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关于上述道理，当代诠释学理论有很好的说明。我国已有学者指出：“当代诠释学理论给我们提供的一个重要的启发是，任何文本在意义上都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也就是说，不同时代的人们完全能够从自己时代的生活世界的本质出发对前人留下的文本做出新的诠释。……尤其当我们借鉴当代诠释学的某些成果，对马克思哲学的文本重新加以理解和反思的时候，马克思哲学便以崭新的理论形象呈现在我们的面前。”^① 这种说法是很有道理的。任何理论都必须有物质载体，多数情况下它就是所谓的“文本”。但文本是无言的存在，它需要人们加以解读，所谓理论，只是人们解读文本的结果。由于阅读主体在实际需要、文化背景、社会环境乃至个人兴趣与特点上的不同，他们对同一个文本的解读结果不可能完全相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有多少个阅读主体，就会从同一个文本中解读出多少种理论来。即使是同一个主体，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环境中，也会对同一个文本有不同的理解。后期的诠释学理论，如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哲学，把诠释学本体论化，认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对象根本不是外在于认识主体的纯粹客体，“而是在伴随着主体的理解而展开、不断地被重构的世界”。这种说法虽然有相对主义之嫌，但却符合历史事实。例如，基督教最主要的经典就是一部《圣经》，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人通过对同一部《圣经》的不同解读，突出其中对自己最具实践意义的内容，结合其他因素，形成了东正教、新教、天主教三个不同的派别，至于小的组织或流派更是不计其数。这些派别、流派、组织的理论，都是基督教理论适应各种条件的“化”的结果。由于这种原因，现实生活中只有各种互有区别的具体的基督教理论，统一的基督教理论是不存在的。

① 俞吾金：《实践诠释学——重新解读马克思哲学与一般哲学理论》，13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